教育视野

大学如何科学决策

□ 杨　忠

将现代治理理论运用到高等教育领域，探讨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不仅必要、而且迫切。在这其中，建立和完善大学科学决策体系，是落实健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关键，而这却恰是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最为薄弱的领域之一。

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

根据我国目前高校决策的权力结构来看，至少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政治决策、行政决策与学术决策的边界模糊，其实质是政治权力、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冲突。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着教育行政化的倾向，导致高校内部政治权力、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不平衡的问题比较突出。学校的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作为体现学术权力的机构，往往被定性为学校在学术上的“咨询参谋机构”，并不拥有最终的决策权力。同时，学术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也包含较多的党政管理干部，政治决策、行政决策与学术决策的边界十分模糊。

学校决策与院系办学的关系有待优化，其实质是学校层面权力过于集中与基层院系办学不够自主之间的冲突。目前情况来看，我国高校学校层面与院系层面的决策范围仍然定位模糊，学校层面的决策权仍然相对过宽、过细，院系层面对教学科研等学术活动的决策权较小，这不仅影响了院系参与大学治理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形成民主监督、权力制衡的有效机制。

决策主体的能力素质有待提升，其实质是管理者行政权与师生等多元利益主体参与权之间的冲突。随着高校决策内容的日益广泛和决策环境的日益复杂，决策者把握信息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也日益显得非常有限。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不少学校有类似的组织或机制，但这些智力支持因为过于零星分散，对决策的参与支持往往停留于表象层面。

推进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提升大学治理能力，孕育特色治理文化、取得显著治理成效，就必须立足于实现高校基本职能的治理目标，探索构建大学科学决策体系的现实路径。

立足“元治理”视角，协调党委决策和行政决策。在大学治理过程中，应当立足“元治理”思路确立党委的角色地位。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办好社会主义大学。党委领导是我国高校最大的特色。这一特色能否转变为发展的有效性，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并以此为指导做好党委决策。要坚持党对高校的领导不动摇，加强和改善党的高校的领导，不断提高党领导高校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充分发挥党委在意见综合与宏观决策中的主导作用。鼓励和引导大学中各个相关利益主体参与决策、表达意见，是党委的一项重要工作。目前我国高校都设有代表不同利益主体的机构，在决策前也大多有相应的意见征询机制，但却较为缺乏必要的意见综合机制，从而使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分散的意见和建议，能够形成对科学决策的有效支持。要正确协调好党委领导和校长负责的关系。若能从“元治理”的思路出发，那么应充分发挥党委主导作用、实现由意见综合到宏观决策的顺利过渡；而一旦决策形成，则应由校长充分发挥行政权力，通过一系列的具体措施推动宏观决策的落实，从而真正促进科学决策的制定和实施。

适应大学治理离散化趋势，协调统筹顶层设计与基层决策。现阶段特别重视解决好以下两方面问题：一是注重高校决策的不同类型，突出协调好行政决策和学术决策之间的关系。学术权力在高校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因此大学治理科学决策的关键是要根据决策类型加以区分，推动实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各就其位、各司其责。二是注重决策的不同层次，既要做好顶层设计，又要鼓励基层创新。在学校统一领导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决策重心下移，充分发挥院系的决策主体作用。为此，高校应该注重发挥院系主体性，努力消除信息流动的壁垒和管理环节的障碍，逐步实现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的优化。通过合理界定不同权力以及权力主体之间的决策范围，逐步由原先直接的行政管理转变为目标管理。明确院系党组织、行政班子以及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基层组织的各自职责，尊重和发挥其在不同决策范围的权力使用和利益表达，实现政治决策、学术决策和行政决策的协调统一。

把好重点环节，切实提升决策主体的能力和水平。正视大学决策面临的各种复杂性、现实性挑战，从切实改善和提升决策主体能力水平出发，推动科学决策、良性发展。一是坚持党委领导，这是完善中国大学治理的基本前提。着力发挥党委在把方向、抓大局方面的主体作用，规范党委常委会（全委会）其在大学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发挥好在意见综合与宏观决策中的指导作用，更好地支持校长行使行政权力。二是把握好科学决策的重要环节。正视科层制逻辑与大学多元主体治理逻辑之间存在的断裂，充分做好意见综合的决策前期准备工作。特别重视决策制定后的执行和监督。决策制定后，要着力推进决策实施，因为只有当决策真正转变为学校发展的成效之后，才能够称之为科学决策的完成。在当前形势下，要特别重视新媒体、自媒体以及青年化时代特征对大学决策的影响。三是重视开展大学治理的文化建设，切实提升决策主体的治理能力。从总体上来说，大学治理不仅需要制度的完善，而且也需要文化氛围的营造和熏陶。在大学决策过程中，需要权衡来自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声音，并通过意见综合来推动科学决策。这就需要积极开展大学治理相关的文化建设，培育公共理性、提高责任意识，并可以从一些小型的决策“训练”入手，引导不同相关利益主体学会运用理性对话、协商的方式，推动科学决策和大学治理。作为一个决策者，要注意避免决策中的非理性因素影响，如个人视野、能力、情绪等，找到切合实际的优化方案，优化决策过程、提高决策质量。



当生命邂逅生活

□ 李文文

翻开《论语》，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

这几言，人们再熟悉不过了。从字面上理解，在讲对待学习、交友和他人能否理解自己的态度。但为何将这样三部分放到《论语》首篇首章，它们之间有联系吗？背后有何深意？

《论语》是表达孔子思想的经要，它的开篇一定与孔子的人生主题相应。他一生颠沛流离，四处奔波。他心系天下苍生，希望百姓安泰，有着实现天下大同的政治抱负。如果这样的理想和报负可以实现，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种喜悦从心底洋溢。

能够实现理想，自是最大喜悦。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就当孔子希望施展抱负时，动触了当时鲁国贵族的利益，基本划上了孔子政治生涯的句号。

既然鲁国不能实现理想，该何如？孔子的选择是不舍不弃。他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朋，就是朋友。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天下如此之大，可有志同道合之人？于是，孔子开始周游列国，本质上他在寻找志同道合之人。然而，十四年的周游列国带给孔子更多的失望，甚至绝望。孔子生活的年代，周天子已经失去号令天下的权威，诸侯混战，大国欺负小国，小国人人自危，谁人还能听得进仁爱、忠信的思想。面对现实，已经一退再退，由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这时对于自己的理想与信念该何如？孔子有他的坚守，有他的选择。

在孔子看来，芝兰花生于深林之中，她为谁而开花，因何而芬芳？开花就是兰花的本分，有人欣赏，她绽放，无人欣赏，她同样芬芳。做人、做事都有本分，对于君子来讲，修道立德就是本分，自然也不会因为遇到困难而改变气节，更不会改变自己的信念与执守。

《论语》在它生命的开始带给我们启发：当生命邂逅生活该何为？孔子的选择是：面对希望，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面对失望，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面对绝望，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无论是自我价值的最高实现，还是退一步得到志同道合者的认同，还是再退的坚守与执着，人生可以无处不自在。也只有做到理性地面对绝望，安然地面对失望，才可悠然地面对希望。不至于绝望时颓废，得意时忘形。整部《论语》也就由本章开始。如朱熹所言，这是入道之门、智慧之门。

经典今读

言之不足，表情包之？

□ 赵　勇

这个学期末结课的时候，一位本科生同学给我写来一封邮件。邮件中，她提到了今年年初的“FB表情包大战”，随后，她又谈到了自己的亲身体会：“我是写小说的，近来写小说，越来越发现了一些现象：在想描述一些情绪、动作时，第一个跃入我脑海的竟然不是汉字和形容词，甚至不是我构想中的人物剪影，而是那些动作夸张的表情包！在描写的时候，在我棘手的时候，更是数次下意识地想要使用颜文字。”她的室友的一个说法也让她很受震动：“我更喜欢在网上用表情包聊天，而不是现实中吹牛。”她担心，长此以往，他们这代人可能会逐渐失思，乃至失语。

她的来信引起了我的深思。说实在话，这类问题我以前并未特别关注过，原因在于，颜文字我虽有耳闻，但因为并不与年轻人在网上扎堆儿聊天，也就没有使用的机会。而表情包，虽然我也偶尔用之，但那全都是QQ、微信上自带的那几个物件。“金馆长”之类的生动形象我是从没用过的，原因之一是嫌麻烦。据说，颜文字和表情包的功用之一是可以把表达变得含蓄、暧昧，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而我与人打交道，追求的是表达的准确、明晰，这种新式武器一时也就派不上用场了。

但我不用不等于别人不用，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在叽叽喳喳或窃窃私语时，已经在用一种迥异于我们以往习惯的言说方式表情达意了。他们创造着也使用着一种新的人类语言，语言顿时变得活色生香了。

那么，又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正统的语言学家估计不高兴，因为这样一来，就玷污了语言文字的纯洁性。但我总觉得，语言文字与时代也是同步前进的，甚至我们还可以说，语言文字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书写工具革命和高科技的产物。很难设想，如果没有互联网，没有鼠标键盘、PS技术和各种便捷的输入法之后，颜文字和表情包会流行起来。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颜文字和表情包，其实也是对我们这个视觉文化时代的一种迎合。美国的一位理论家丹尼尔·贝尔早就说过：“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以前我们琢磨视觉文化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全民摄影、影视剧的泛滥或无图不微信、有图有真相，现在看来，显然也需要把“文字图像化”纳入其中了。也就是说，当整个时代把一切都图像化之后，语言文字也很难洁身自好。或者是，浸淫于图像文化之中的小伙伴们再来面对那些愣头愣脑的方块字，就很难不生气撮火，于是，以图像稀释之、游戏之、恶搞之、翻新再造之，便成为其惯用手法。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囧”字本来呆在词典里好好的，也有着自己的特定涵义，但网友硬是把它拽出来，重新梳妆打扮一番，“囧”立刻就变成了“囧”。后者虽然也就多了一横，封了个口，但它已不是字而是图了。在印刷文化中，“囧”意谓着“光”和“明亮”；但在视觉文化中，“囧”是什么意思，我就不需要再啰嗦了，因为大家都懂。

但话说回来，颜文字和表情包进入到语言系统中后，究竟会对我们的思维、言说和书写带来怎样的变化，却是大可以讨论的。欣赏古诗词，我们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是“诗中有画”，那是因为王维用语言营造了一种画面；阅读《红楼梦》，我们一下子记住了林黛玉的容貌，那是得益于曹雪芹的肖像描写：“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这种描写依然是语言艺术的产物。在这里，出色的文字组合引发了人们的联想，催生了人们的心理意象。由此看来，在以往的文学写作中，文人墨客既是语言的守护者，也是语言的开掘者，他们炼字炼词炼句，上穷碧落下黄泉，直至找到最好的表达方才偃旗息鼓，否则便寝食难安。

而现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些作家写作时，是否能找到妥帖的表达，或许已不是他们主要考虑的事情了。或者是一下笔，表情包颜文字就在自己的脑海里晃悠，于是，言之不足，故表情包之；表情包之不足，再配点颜文字。一时间，作品中语图交加，电闪雷鸣，小伙伴们读得也格外开心。那位同学告诉我，如今的网络小说（特别是快小说、轻小说）已在如此操作了。而这种写法如今还未进入主流叙述中，大概是因为我们这些老家伙或半老不老的家伙人还在，眼里揉不得沙子。将来有一天，小伙伴们长大成人，成为这个世界的主角，颜文字和表情包是不是会成为交流和写作的主要工具？

如此这般之后，思维会发生退化吗？这个问题还真不好说。因为写过《视觉思维》的阿恩海姆就曾说过：“语言只不过是思维的主要工具（意象）的辅助者，因为只有清晰的意象才能使思维更好地再现有关的物体和关系。语言的功能基本上是保守的和稳定的，因此，它往往起一种消极作用——使人的活动趋于保守和静止。”在他看来，人的思维活动主要是靠心理意象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视觉获得的意象扮演着重要角色，而语言则处于次要位置。果如此，颜文字与表情包的流行对思维应该没有多大影响。

但我以为，对思维影响不大不等于对表达没有影响。因为根据用进废退的基本原理，若一个人提笔为文，表情包和颜文字总是蜂拥而至，传统的语言又总是处在休眠状态，久而久之，语言表情达意的能力就会弱化。作家刘恒写小说也写剧本，但他总是把剧本写成文学剧本而不是电影剧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意识到：“如果长期从事电影剧本的写作，也就等于长期处于忽略语言的那么一种状态，长此下去，作者的语言运用的能力便会衰退。等你返回身去再写小说的时候，有可能语言这个肌肉已处于萎缩状态，功力不足了。”那位同学给我写信，所担心的便是这种情况。

于是我跟那位同学说，还是尽量学会在两个战场作战吧：在社交平台，你可以用“B-52轰炸机”，拿表情包砸，用颜文字侃；在小说领域，你大概还得用“小米加步枪”，慢条斯理，把语言调理到最佳状态。如果能在两个世界自由穿行，迅速切换，也许就不必担心失思和失语了。

说出这番话时，我的想法大概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大都在顺应着这个视觉文化的时代，唯恐自己落伍。但实际上，我们也需要一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尤其是要想真正成为作家，做语言世界中的遗民恐怕还是更保险一些。

文化漫谈

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

（上接1版）第三，推进任何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第四，如果不抓紧消除社会上存在的大量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会影响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信心；第五，“改革是要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了意义。”因此，“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可见，在习近平的观念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享发展”，是改革发展成功与否的判定标准。

其次，“共享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标志。习近平反复强调，“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而必须“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他还指出，“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如果我们的发展不能回应人民的期待，不能让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这样的发展就失去了意义”。这里，习近平不仅把“人民共享”看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标志，实际上也是把“共享发展”看作发展成效的检验标准。

最后，要用“共享发展”理念统领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实践。习近平没有停留在“共享发展”这一抽象概念上，而是要求把这一发展理念体现在改革开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具体实践中。例如：他特别强调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均等化和共享水平；强调促进教育公平，让十三亿人民享有更公平的教育；强调建立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强调使收入分配更合理、更公平，等等。这些从实践层面对“共享发展”理念的阐发，使之作为改革开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检验尺度，更具可操作性。

习近平把“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作为改革开放成功与否及全面小康社会建成与否的判定标准，实际上为经济社会发展确立了根本价值尺度和思想遵循，也是对长期以来一些人改革方向迷失、发展目的模糊现象的矫正。

“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高度界定“共享发展”

习近平强调“共享发展”并不是简单地就发展论发展，而是把“共享发展”上升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在就“十三五”规划建议听取党外人士意见的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际上，他一再强调的“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判断改革发展是否成功的标准是人民是否共同享受到改革发展成果”等等，都是从不同层面对“共享发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所作的阐释。因为，在习近平看来，人民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主体，理应也是社会主义发展成果享有的主体。他强调“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并把“共享发展”概括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全新概括。

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学习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所作的《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他还强调，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那就是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我们都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些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内容，如果丢掉了这些，那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了。”

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逻辑延伸，那么，“共享”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表述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这之前，习近平也曾多次作过类似概括，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保证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必须使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必须坚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等等。可见，在习近平看来，“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公平正义”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根本原则”“内在要求”这种本质特征层面的范畴。前面的论述中已经明确，在习近平的发展理念中，“共同富裕”“公平正义”等，都是“共享发展”的不同说法，因此，都是“共享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不同表达。

习近平关于“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论断，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揭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定位，也是他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挑战、对现实政策某些方面出现的问题、对社会上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质疑或曲解、对西方对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诋毁和攻击，所作的明确、坚定的回应和回答，显示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的高度政治清醒和高度理论自觉。

习近平“共享发展”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人民共享”标准，从而把中国的发展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习近平“共享发展”观坚持“共享”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而把对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